

当今讨论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问题,可能先需要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教育的现状有一个认识,然后则有必要思考和探讨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而一旦涉及到当今人文教育及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显然是难以让人乐观的,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这里特指“科技”,下同)勃兴压倒人文似乎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早已如此。早在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流行之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就曾预言,在未来的教育中,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和文学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斯宾塞的预言正毫无悬念地变成现实,他甚至发出感叹,西方社会的某些教育机构或者大学,正在稳步成为一些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科学大工厂”。文学艺术与人文教育根本难以抵御科学教育占压倒优势的挤压。及至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学主义思潮更是一路狂飙,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占绝对优势。在这种形势下,艺术和文学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艺术教育和文学教育也日渐萎缩难以为继。从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希利斯·米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今美国的大学中,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多改学电子信息传播之类的专业课程,随之教授文学课程的教师也越来越少,为了“饭碗”纷纷改行教别的课程。即便是仍然在开设文学课程,在科学主义思想占压倒优势和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也带来了文学教育的“科学化”转向,即更多关注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和叙述技巧,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不过是一种操弄语言符号魔方的“技术活”,文学教育也只是语言教育的一种延伸与附庸。除此之外,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不断泛滥的形势下,文学本身也在不断“泛化”,成为科技主导下的消费文化的附属品。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变化,使得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论断,既然文学本身“终结”了,那么文学教育又何以为继?尽管“文学终结”这个论断广受争议,但文学及其文学教育日益困窘的现状,却是谁也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与西方社会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许还没有遭遇如此大的危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其中包含文学教育)失衡的状况也许还没有这样严重,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西方哲人的预言也正在我们的现实中应验,科学压倒人文这种状况也已成为十分明显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切忧虑。比如在基础教育中,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学科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在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大学自主招生取消语文考试,如此一来语文很可能就要被“边缘化”了。再者,在当今语文学界,据说也存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而“工具”论似乎更占上风,认为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基本功,而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 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

□赖大仁

没有必要学那么多文学。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所关注和热议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大撤退”、“文学大撤退”等现象,便与这种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关。那么大学教育中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从学科专业的整体布局来看,最近国家刚刚正式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13个大学科门类所涵盖的一级学科专业数量,工学类38个,理学类14个,医学类11个,农学类9个,艺术学类5个,文学、历史学、哲学三大类全部加起来的总数7个,由此不难看出孰轻孰重。从大学招生情况来看,每年理工类专业招生数都在三分之二以上,文科类专业则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大学里普遍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如今在有些大学已不见踪影,另一些大学虽仍作为全校公选课开设,但选修的学生实际上寥寥无几,大多都选修那些实用性课程去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毕竟还有一个中文专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是文科中的领头专业,既被学校看重也被社会看好。如今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偏重于实用技能,使得中文专业学生就业比其他专业更困难,因此招生逐年下降,办学日益陷入困境。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的名义下,一些学校开始调整改变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减少文学类课程,加强交际语言、实用写作、电子文秘等实用类课程;而在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也热衷与国外新潮“接轨”,追逐“科学化”转向。如此等等,科学压倒人文的总趋势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科学压倒人文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或者说人类不可避免和改变的宿命?这种情况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后果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存在的是否必然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究竟应当如何合理健全发展?现实的不合理存在是否需要改变它?我们如何去改变它?具体落实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上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和深刻反思。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出科学压倒人文的现实,并对由此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绝对不是要反对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本身,更不是要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为了人文而反对科学。实际上,科学与人文,并非天然对立,更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问题只在于,如果承认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那么二者就必须要求一定的平衡,否则就无法正常地发展前进,这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上,为了发展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尽快解决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问题,因而更偏重科学发展的方面,也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当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已经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甚至形成“一边倒”的惯性与偏向,而人文精神的建设则明显滞后,在科学领先的挤压之下产生了明显失衡,并且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之时,那就必然要寻求调整两者的关系,要求充分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以求得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应当说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从文化教育而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同样不言而喻。

而在整个人文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功能。“文学是人学”,这就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主要作用于培养人的人文素养。为什么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都需要有文学教育?以及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文学教育何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教育何为?

教育的本性在于培养人,培养人格健全和有生活本领的人,使人更加完善,使生活更加美好。对于学校教育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学校教育而言,通常我们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实际上其中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人”,即着眼于人格培养,使每个人都成为正常的身心健康的人,成为人格健全、善良智慧、精神丰富的人;另一方面是培养“才”,即着眼于才能培养,使人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专业技术创造才能,有自食其力的生活本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在立足于培养“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才”,使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这方面,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表达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比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集。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培养一批有个性的学生,有朝一日他们就能开始再造文明。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与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教育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的教育,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之于人类也。”竺可桢说:“学习诚实做人,勤勤恳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梅贻琦说,教育之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潘光旦说,如果学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而没有人文情怀又自以为是的专家,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就越不可问。

先哲贤们的这些教诲以及他们的人生实践,告诉了我们教育的本性和真谛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人格精神的培养甚至比学习知识技术更重要。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以此为鉴,而是过于急功近利,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科学教育压倒人文教育,一味追求培养“经济人”、“技术人”、“工具人”。这样的人虽然学到了干事挣钱的本领,却并没有明白做人的道理和生的意义,没有养成应有的人文学情怀,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很容易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钱(利)是万物的尺度”。倘若如此,那无疑是教育本性的迷失和教育实践的偏差。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学生凶杀案,如马加爵残忍杀害同学案,药家鑫肇事后刺杀母亲案,还有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未成年中学生结伙在社会上流浪并抢劫、强奸、杀人,还发生过多起中小学生在学校集体凌辱残害同学事件,等等。虽然这些只是一些极端化的个案,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否与整个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有关呢?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最起码的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没有对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与敬畏,而是

过于自私、冷漠、孤独、偏执,一旦遇到一点不如意便绝情怨恨,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本事,又能指望他做出多少有益于社会的好事来呢?而一旦为了自私目的,又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呢?

应当说,人的这种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自生自长的,而是要靠教育教化培养起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本来是非常注重修身和教化的,但在“反封建”的进程中不加分析地把这些文化教育传统也都反掉了,加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主义压倒一切,现代人文教育也一再萎缩,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当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教育的迷误和偏差,真正回到教育的本性上来,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及其特殊功能。笔者曾多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讲过,也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认为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并不矛盾,文学其实是更高级阶段的语文;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也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可以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在语文学习的初级阶段,其“工具性”更突出一些,那么随着语文学习的提升,其“人文性”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加强,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将实现更完满的融合,就像一切好文章(包括文学作品)最终都将在更高境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一样。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是为了强化学生的语文基本功,仅仅在语言文字技艺的教学方面下功夫,让学生没完没了地做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练习题,恐怕也是难以奏效或者是事倍功半的。其实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需要多读、多思、多写,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别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或优秀作品,是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典范,只要勤于阅读,用心领悟,并且勤于动笔练习写作,那么阅读和写作能力就可以不断提高。而在这个扩大和加强阅读的过程中,也必定能得到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滋养和艺术审美的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培养,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何必要如此急功近利排斥人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呢?

总之,我们的教育应当回归本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应当回归育人本性。而人的培养和成长,既需要重视科学教育,致力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同样也需要重视人文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人格和人文关怀精神,在这方面,文学教育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要问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那么它最根本的理由和根据也许正在于此。

## 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13)

# 艺术创新的动力源

□廖 奔

《人民日报》2011年2月11日文章《文化被淘汰不是坏事,淘汰腾出创新空间》,报道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淘汰论”,其主要观点是,太多的传统挤占了空间不利于创新,必须淘汰一部分来为创新腾出地方;地方戏种类繁多,积淀程度和目前境遇不同,不都具备保存价值,必须做减法;非常重要而且也能够生存的要传承,后继无人、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的则不能都保留。本人对此议感到惊讶,对其实地戏问题上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的立场不敢苟同。报道的余秋雨观点里面似是而非的地方很多,我非常想把它们理解为是不经意中的谈论,未经本人的学术裹挟而形成严密逻辑,本不欲对之作出反应。但因其中涉及了一些基本理论范畴,为真理故不得不辩。兹申述款曲如下。

### 地方剧种的价值应如何确定?

地方戏是中国独有的戏剧现象,它曾在中华大地上长期流传繁衍,催生了明清至今地覆海涵的民俗文化。近年全球开始重视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民间存活的众多地方戏再次进入了国人眼帘。

地方戏与民众互为依存的特殊关系是它的根性。不同的地方剧种流行于不同地域,成为或曾经成为当地的娱乐对象和文化主体,而与民众发生精神融会和情感关联。不同地域观众都培养起了对地方戏的熟悉感、亲切感和幸福感,地方戏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审美特征,就在地人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浸润、渗透为其心理结构中的文化沉淀,成为其精神家园的珍藏。不同的地方剧种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观众群和拥戴群,以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吸引着一方爱好者。眼下我们面临全球化背景下保护本土文化资源、守望精神家园的重任。什么是我们精神家园?乡音乡景土风民俗都是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家乡戏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之一隅。每一地人的寄托、记忆、眷恋和原乡情结各异,故地方戏的精神和艺术价值更要看由各地人去认定,甚至由各地每一位个体的人去认定,而非外人可以随意评判代替处理率意罢黜。

在某些强势文化日渐引起人类普遍警觉与抵制的当今世界,人类具备多样性、不同样态的文化,具备相等价值的观念已经深入世界人心。同样,中国当下的任何地方剧种,无论它的覆盖面、观众群、影响力大小,也无论它的历史长短、积累厚薄、特征强弱、美学形态完善与否,都具备同等的人类文化样态价值。

事实上,对传统的发现与再发现,为人类艺术史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20世纪欧美艺术家从非

洲、澳洲土著艺术里寻找到创作灵感,诱发了现代派艺术的崛起。欧美戏剧家从日本、中国、巴厘岛古老戏剧样式里发现了表演的原始可能性,促成了舞台变革的大潮。中国戏曲研究者从边缘闲塞山野乡村的傩戏、目连戏里发掘出传统表演的原始基因,惹动了当代戏剧创新的灵感。传统激成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创造力迸发重复证明着一个真理:人类文明的任何过往都在指引着未来。

因而,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是种子的先决存在,一旦遇到适合的条件新苗即会蓬勃而发,失去种子任何东西都无法凭空而生,而哪一部分传统、哪一个种子会勃发,是无法料定并事先作出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时尚认可的种子就一定勃发,先期“淘汰”或许就会消灭一个未来能够走向蓬勃兴盛的艺术种子。

### 文化被淘汰是人类进步的需要还是它的历史悲剧?

我最惊讶于余秋雨的是这句话:“一些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如此来说,人类历史上印加文化、玛雅文化、雅利安文化、古埃及文化以及中国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巴蜀文化的消失,倒是值得庆贺的吗?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继续往前走的绝大部分,但历史没有给它们机会。

文化淘汰的判断要看它的前提,如果是腐朽文化,自然应该被淘汰。然而悲哀的是,历史上的文化淘汰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大多不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有价值的文化也被大量反复地淘汰,甚至被人为地摧毁,这是文明发展的悲剧。但愿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自觉意识,不再去做这样的事,哪怕是“误伤”也不行。

尽管优秀文化被淘汰,人类自然还是会向前走,去继续创造新的文明,因此我们提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乐观精神,但这不等于我们要去砍削自己的积累。

### 不要对濒临灭绝的文化进行保护?

农耕社会的艺术确实大部分是自生自灭的,但后工业社会对传统艺术也能采取同样的观念、方式和态度对待吗?当今世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否!这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的前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条件却与余秋雨认为的相反,必须是“濒临灭绝”的而不是“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

人类之所以需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就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弱势,需要特别珍惜和加以特殊对待,而人类已经有能力对待。我个人非常赞同国

际社会保护濒临灭绝文化的这种做法,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进步。正如余秋雨所说,艺术确实不应该通过这种道路走出来,但文化传承却正在通过这种道路向前走。在这一点上,许多中国学者为日本能够最早在政府设立起“文化保护财”机构来重点扶持能乐、歌舞伎等传统文化种类,我们很晚才有这种明确意识而感到惭愧。通过确立“名录”来促进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做的一项正确的事情,也是众多国家尤其是传统国家包括中国的联合智慧真正发挥作用的体现,我们切不可认为这是在为人类创造设置阻碍。

传统文化形态是否都要保护,取决于当前的力量和可能性。国家当然应该尽量做一些,地方政府也要尽量做一些,更提倡民间力量的“众人拾柴”,尽量做到保护无遗。暂时没有力量做,不等于不应该做。国家现在已经不再单纯强调GDP数字而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指奋斗,宁可经济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考虑社会综合实力的提高,文化上更应如此,作为传统文化大国的中国尤其应该如此!

顺便说一下,余秋雨下面这几句话也是大可值得商榷的:一、“不是所有剧种都要……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然存在的,所有自然存在的地方剧种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谁把它“变成”的。暂时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录”,也不等于它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有着无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名录”里列入的只能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二、一些剧种“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躺在床上靠打强心针维持的是旧经营体制下的剧团,所以需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我相信该剧种还是有其欣赏者的,只是需要为之培育一个较好的演出市场。三、“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比如说像我的学生的学生,不要再分到一个已经没有太多希望、两年也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面去?”事实上现在的学生已经“分”不到任何一个单位去了,经营不善的剧团当然也难以聘到正规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但或许有一日新兴的民营剧团会有条件吸纳他们。

四、“有没有可能……汲取一些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剧种,为当代人所喜欢?”“创造”如果是凭空而起,定将无疾而终,重蹈20世纪20年代“国剧运动”的覆辙。如果是依附某个既有剧种,那是舞台上一直在进行的实践,不是假设,但也难说能够创造出新的剧种来。

## 洞察

## 避免“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一词,来源于时评。它本为时评人抨击相关职能部门言辞或举措时所常用。然而如今,一些时评和时评人也开始说“正确的废话”。时评是与新闻一起实现舆论监督职能的。时评在影响事件进展、抨击丑恶、弘扬真善、纠正政失、维护法律等方面,可谓功不可没。这无疑是国家广开言路的一大好处,也是时评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的原因。基于这一点,时评和时评人无疑需要坚持“敢说话、说真话”的勇气,努力体现舆论监督职能;二需要具有“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说民之想说”的民生情怀和人文精神,将推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视为己任。有了这两点要求,时评就应自我规避大话、套话,就理应少说“正确的废话”。“正确的废话”虽然并没有错,但往往给人的感觉是说了等于没说。充满“正确的废话”的评论,其看起来高深,实则浅显,其貌似意见领袖,实为绕舌废话,实为评论力量和媒体资源的浪费。

刘鹏(新疆)

## 生命教育岂能缺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两名12岁的少女相约在4月8日清晨自杀,目前一个已离开人世,另一个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据4月13日《都市晨报报》)同样的例子还有:2010年7月,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喝农药自杀;同年3月,安徽省阜南县集寨小学五年级4名学生相约自杀。再联系到大学生“马加爵杀死同学案”、“药家鑫捅死伤者案”,以及近日发生的“海归”留学生在机场刀刺母亲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生命意识在这些孩子身上,到底被置于何等地?分析这些典型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一,严重缺少关爱成为青少年悲观主义情绪产生的根源。其二,生命意识教育的缺失,成为一些学生自杀和杀人的根本原因。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教育越来越向自私狭隘的方向发展。功利化的受教育目的,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对考试成绩的片面要求,对升学率的冲动性追求,使得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上紧的发条一般蓄满压力。一旦这种压力冲破尚未成熟的幼稚心理底线,其严重后果即会凸现出来。大学生李颖在谈及“药家鑫捅死伤者案”时,以一句“我要是他,我也捅”告诉了我们一切。这种对生命唯一与可贵认识的严重不足,让人叹息!加强生命教育,不仅需要家庭和学校明明白白地告诉孩子,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应该如何尊重与敬畏生命,更需要以直观与形象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与坚韧,认识到保护自己生命与维护、尊重他人生命的神圣;不仅要以开展生命讨论、生命课等方式去教育孩子热爱生命,更需要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孩子的生命意识与人生价值观念;不仅要关心孩子的身体成长和生活需要,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与精神需求;不仅要家庭、学校联手努力,也需要全社会树立生命至上意识,努力净化网络、影视、日常生活等环境,为青少年树立生命意识,健全身心,合力创造条件。

刘鹏(新疆)

## 非法网络公关的整治

非法网络公关具有以下犯罪特点:一是手段多变,有的被金钱收买利用论坛炒作网帖给竞争对手“灌水”“栽赃”,有的为一些不良公共事件删帖消声,有的通过炒作制造虚假民意牟利,有的在网上歪曲捏造事实进行敲诈勒索。二是危害深广,非法网络公关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而且延伸现实世界,破坏市场正常秩序,影响公众对客观事件认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是组织序列全,网络危机公关是“水军”资源的集散地,一般来说公关公司拿到业务订单后,找到固定“水军头目”进行任务分配,“水军头目”再指挥“水军”进行实际操作。如何让常态整治正常化,具体说有三点:一是强化法规建设,公共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不能完全依赖自律,无规则可循,必须从业务流程、收费、原则上拟定一个刚性准则,约束网络危机公关活动,维护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二是监管落到实处,为何非法网络公关行为大肆蔓延,除了商家惟利是图之外,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确保公共行业的正态发展,既要靠公共企业守法意识、诚信经营,又要靠监督者的监管到位,监管惟有得力,法律才会有尊严、威慑力。三是启动问责机制,对于在公共关系监督中不作为、乱作为的部门和个人,要采取零容忍,依法依规严惩,促使监管部门恪尽职守、